

經典、特藏與數位人文： 對後疫情時代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之淺見

Classics, Special Collection, and Digital Humanities: Perspectives on
the East Asian Librarie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Post-Covid Era

楊繼東 Jidong Yang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館長

Librarian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Email:

【摘要 Abstract】

本文對北美東亞圖書館的歷史做了簡單回顧，對新冠疫情造成的各種影響進行了分析，並對今後的東亞圖書館發展趨勢做出了若干預測。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essay gives some predic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ies.

【關鍵詞 Keywords】

東亞圖書館、新冠疫情、特藏建設、數字人文

East Asian Libraries; Covid-19 Pandemic; Special Collection; Digital Humanities

2020 年初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轉折點。圖書館與其它所有行業一樣，未能倖免疫情帶來的多種不利影響。但是，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機同時也是一個契機。新冠疫情加速了圖書館在過去二十多年已經發生的一些變化，並可能使其長久化。隨著疫情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成為過去時，圖書館的從業者們也跟其他行業一樣，對歷史和未來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規劃。本文試圖從美國大學圖書館體系中的一個特殊分支即東亞圖書館的角度，審視後疫

情時代的發展趨勢。

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美國東亞圖書館起源和演化的歷史。美國建國較晚，其對東方各國研究的起步，晚於歐洲，遑論日本。歐洲漢學的建立，始於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而美國直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才發生類似過程。隨著基督教新教的各個教會派往亞洲各地的傳教士日益增多，他們將大量的異域見聞和書籍帶回母國，從而開啟了美國研究亞洲的先河。1842年，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並開始編輯出版《美國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此乃美國東方學的濫觴。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傳教士始終是美國東方學的主力。他們是東方學會年會的主要參加者，也是學報論文的主要貢獻者。他們中的很多人向各自的母校和其他一些機構捐獻的中、日文書籍，構成了美國最早的幾個東亞圖書館，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麥嘉締圖書館（The McCartee Library）。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對亞洲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學院化的過程，高等教育機構逐漸取代基督教會成為培養新一代東方學者的主要力量。飛速發展的經濟也使得很多大學和機構能夠以豐厚的薪金從歐洲聘請到成名的學者來主持教學和指導博物館等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儘管大多數美國民眾和政客對本國以外的世界事務還是興趣寥寥，但是知識界以及在經濟起飛年代積累起龐大財富的很多財閥們已經充分意識到二十世紀將是美國的世紀，而國家需要為此做好準備。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多年時間裡，這些財閥們建立的基金會和文化機構比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都撥出大量款項支持開展對東亞各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用來購買東方各國的文獻資源。與此同時，一些大學也開始撥出學校的常設經費發展東亞研究項目和東亞文獻館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得美國徹底擺脫了孤立主義傳統，其民眾和政客們開始具備全球視野。在太平洋戰爭和韓戰期間應急培養的大批東亞語言人才，為東亞研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五十年代後期國會為應對冷戰而通過的《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使得聯邦政府獲得雄厚資金支持全美各地的大學開展外語教學和研究工作。於是美國在很短的時間裡迅速超越歐洲，成為東亞以外收藏東亞文獻最豐富的地區。目前，美國各大學和文化機構每年用於收購東亞文獻的資金遠超過歐洲、澳洲和加拿大的總和。很多分佈在美國南部和中部的州立大學圖書館用於購買中日韓文的經費甚至超過了劍橋、牛津等歐洲老牌學府。

在二戰前後，美國對東亞包括中國的研究也開始呈現出與歐洲傳統的東方學（Orientalism）和漢學（Sinology）迥異的特點。跟歐洲偏重古典語言和文化的學術傳統不同，美國在 1930 年代就推出了「地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概念，強調以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方法對當下的非西方世界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二戰結束以後，「地域研究」的方法論成為美國研究國際問題的學界主流。與此相適應，以推廣這種新型學術為己任的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成立後不久就取代美國東方學會成了全國範圍內最重要的亞洲研究學術團體。

對現、當代東亞問題的重視也充分反映在戰後美國東亞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上。以中國研究資料的收藏工作為例，很多大學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投入相當大的資金和人力蒐集與現、當代中國相關的原始資料。比如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以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出名的密西根大學的亞洲圖書館以及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東亞圖書館，都在這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它們收藏的國共兩黨原始檔案、重要人物的日記、通訊和手稿、各種影像資料和地圖等等，成為世界各國學者趨之若鶩的資料寶庫。當然，二戰後美國的東亞研究視野並不侷限於與現、當代有關的課題。即使在「區域研究」概念盛行的年代，很多美國學者還是以「漢學家」（sinologist）的身分自居並以此自豪。

大多數成規模的東亞圖書館也非常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收藏，而哈佛燕京圖書館、芝加哥大學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東亞圖書館以及國會圖書館在這方面的工作尤其突出。

到了 1970 和 1980 年代，隨著電腦在美國社會的逐漸普及，它在圖書館管理和學術研究方面的運用潛力也開始被人們認識。美國是全球第一個在圖書館編目和管理的電腦系統中大規模採用漢字的國家。「研究型圖書館聯盟」（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在 1980 年代早期就將數千個中、日文漢字編入 MARC-8 字元集中，此後美、加各東亞圖書館漸次採用特別設計的終端機對東亞語言書刊進行編目，極大地便利了研究者檢索館藏的東亞文獻目錄。於此差不多同時，一些美國學者也開始嘗試用電腦輔助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教授是這方面的著名開拓者。專攻宋代歷史的他第一個將大量歷史人物信息輸入電腦，然後通過演算來解析他們的社會關係網絡。他在去世前將此人物資料庫遺贈給哈佛燕京學社，後來經過不斷編輯、更新，演變成被學界廣泛利用的「中國歷代人物傳

記資料庫」(China Bibliographical Database)。進入 1990 年代以後，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製作的各種全文資料庫陸續被美國的各東亞圖書館採購，極大促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美國的東亞研究領域繼續發生深刻和快速的變化。個人電腦的普及和性能提升，萬國碼(Unicode)字元集的不斷擴展和廣泛採用，以及文獻數位化的全速推進，使得學術研究的方法煥然一新。時至今日，已經很難想像任何不借助電腦就能完成的研究課題。在各個東亞圖書館裡，紙本年代出版的大量工具書比如辭典和古籍索引，也逐漸淪為裝飾品，鮮有人問津。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裡，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在美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迅速興起，並吸引了大量東亞研究學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熟悉電腦和演算法的學者。他們將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地理資訊系統(GIS)、文本探勘(text mining)等研究和呈現方法施用於古代和現代的東亞文獻，做出了很多傳統學術難以企及的成就。在這一波數位學術浪潮的帶動下，眾多美國大學的圖書館包括一些東亞圖書館，紛紛成立相應部門為新型學術提供服務。

2020 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給上述蓬勃發展的勢頭突然按下了暫停鍵。當年三月，隨著疫情在美國各地社區蔓延，絕大多數大學都關閉了校園，開始線上教學。大學圖書館也都停止了正常的服務。此種情形，直至 2021 年秋學期才開始逐漸改觀。到 2022 年秋天，各圖書館基本恢復了正常服務，雖然在大多數館裡，無論是服務時間、紙本書刊流通量還是進館的人數尚未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峰值。不過令人寬慰的是，持續將近三年的疫情給了很多在家工作的同行們一個靜心思索這個行業的歷史和未來的絕佳機會。而實體館舍的關閉，也在最大限度上考驗了學術圖書館在數位網絡時代的生存能力。

我個人以為，疫情後美國的東亞圖書館將跟其他分館一樣，不可避免地更加倚重數位資源及相關服務。在疫情初期，由於館舍的關閉以及紙本書刊的流通完全中止，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幾乎完全以在線上方式向師生提供數位資源。由於版權限制的暫時放寬，師生們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獲得了自由訪問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並任意下載全文的權限。雖然從 2021 年秋季開始，版權保護又恢復到了疫情前的狀態，但是可以預見的是，由於讀者對電子書的接受度在疫情期間大幅度提高，今後其在圖書館整體資源中佔據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事實上，近一年多來大學師生們在向本校圖書館發出書籍採購請求時，經常註明最好能提供電子版，東亞館也收到很多這

類的請求。

電子圖書在資源中佔比的持續上升，當然會對美國大學裡各東亞圖書館的業務帶來系列的挑戰。迄今對東亞電子書的編目、保存、管理、流通都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機制和流程，而且這類資源的供應商不斷發生變化。更為嚴重的是，電子書與電子刊一樣，非常容易被內容供應商以各種理由（比如政治、宗教或外交的理由）進行更改或者撤換，而圖書館和讀者往往不易察覺這類行為的發生。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向師生及時提供真實原味的電子出版品，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東亞圖書館日後的發展趨勢。

除了電子資源，還可以預見的是各個東亞圖書館將繼續大力發展特藏建設。在今日大多數支持東亞研究服務的專業圖書館員的心目中，「特藏」（special collection）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善本古籍」（rare books），還包括檔案、手稿、日記、通訊、地圖、照片、影像、電子文檔等等各種以非書籍形式保存的資源。2022年春天，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出版了本人在史丹佛大學工作期間主編的《書籍之外：北美收藏的特有和稀見東亞研究原始資料》（*Beyond the Book: Unique and Rare Primary Sourc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cted in North America*）。此書的撰寫者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多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介紹、研究了數十個以非書形式存在的東亞文獻特藏，反映了業內同行們對這類資源的日漸重視。但是此書涵蓋的內容還只是北美現有的東亞文獻特藏的滄海一粟。經過上百年的積累，美國和加拿大的很多東亞圖書館都擁有龐大的特藏資源，並在不斷的擴展之中，其來源主要是私人和機構的捐贈。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士和資金對這些稀見資源進行編目、修復和數位化，使之能夠為研究人員使用。我個人認為今後各東亞館除了需要努力爭取總館和館外機構和人士的支持外，還有必要適當調整常設經費和人力的使用方向，將發展和處理特藏文獻作為重點業務來對待。

數位和網絡時代的特藏文獻，並不侷限於可觸摸的實體文獻。如今的很多文獻自出生伊始即只存在於數位格式，而不少美國大學的圖書館開始重視這類文獻的蒐集，主要是通過被動的（接受捐贈）和主動的兩種方式。近年來對數位特藏文獻的主動收藏成為很多大學圖書館探索的熱點之一，它們或自己研發新的技術，或與資訊公司合作來抓取和保存有潛在的學術研究價值的數位資料，尤其是那些容易消失的資料，比如電子郵件和網站網頁等等。史丹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從八年前開始實施一項保存當今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運動（civil society movement）的網絡資訊的計劃，定期

地將一些慈善和公益組織的網站存檔。由於很多這類網站目前已經不復存在，史丹佛東亞館保存的這些資訊成為學者研究當代中國非政府組織時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類似這樣的網絡存檔（web archiving）工作目前還在美國其他幾個東亞圖書館展開，並有可能成為今後各館發展其特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預見的是，後疫情時代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包括東亞圖書館之間的合作會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早在 1970 年代以前，美國的若干所主要東亞圖書館可以將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出版的大多數出版品買齊。但是自從世界進入資訊爆炸年代以來，任何一個東亞圖書館已經無法以一館之力滿足本校師生對東亞研究資料的所有需求，各館之間除了緊密合作，別無他法。在疫情爆發之前，美國各地已經出現了好些密切合作的大學圖書館聯盟，比如常青藤八個私立大學加上芝加哥、杜克、約翰·霍普金斯和史丹佛大學圖書館組成的「常青藤加」（Ivy Plus）聯盟，中西部的「十大校」（Big Ten）聯盟，加州大學系統各校的聯盟等等。這些聯盟內的東亞圖書館同事們也經常會晤，商討館藏發展和服務上的合作策略。今後這種合作的趨勢會持續並強化。資源採購上的協調分工、館際互借、遠程書庫的共享以及數位學術平台的共同開發，將使得各館的資源和服務加速整合。除了與美國國內同行們的合作，我們對與東亞的同行們的合作也有很大的期待。我個人非常希望而且相信，在今後十至二十年裡，美國各東亞圖書館與臺灣圖書館界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可以抬升至嶄新的程度。這種關係對雙方都將有巨大的裨益。

以上是對美國東亞圖書館歷史的簡單回顧，以及對其今後發展的幾點淺見。限於時間和篇幅，對很多重要問題無法展開深入討論。若能起到點拋磚引玉之效，則深感幸甚！